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形成探源*

张纯厚

[摘要] 本文从毛泽东的理论创新与党的集体智慧相结合的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和演变。历史资料证明,毛泽东和党的其它领导人对于统一战线重要性的领悟有一个逐步明晰的过程。在对工农联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结盟的重要性的认识,多党合作、互相监督的体制和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思想,以及灵活务实、广泛结盟和团结与斗争相结合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都有划时代的理论贡献,刘少奇、周恩来、李维汉等人在不同的时期也都有重要贡献。

[关键词] 统一战线理论;毛泽东;中共中央领导集体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0)05-0023-06

政治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统一战线理论是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是毛泽东的理论创新,但同时也反映时代的政治特征,汇集着党的集体经验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思想和智慧。

在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和中共党的其他领导人对于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就有所领悟。1919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提出民众大联合的思想。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将政治统一战线的思想确定为党的纲领。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国共合作的政策。^{[1](p.8)}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实现了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建立。当时,虽有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但党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逐步形成了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群众性政党,并初步获得军事斗争的经验和能力。所以,刘少奇在1926年9月说:“中国的国民革命,一定要社会各阶级民众一致来参加,建立各阶级的联合战线,才可成功。”^{[2](p.4)}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关门主义限制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但以毛泽东、刘志丹、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党内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们在军事斗争中贯彻了统一战线策略。1935年8月1日,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八一宣言》,主张建立全国军民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

1935年12月,党中央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最

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于同年12月27日,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意味着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理论走向成熟。^{[3](pp.151-155)}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并列为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从此,统一战线理论成为党的工作的重要指针,并在革命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

一、对于工农联盟重要性的认识

1919年,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毛泽东谈论城市各行各业民众的联合,尚没有提及农民的联合和工农之间的联合。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首次表示对于工农联盟的赞赏,他说:“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4](p.2)} 在于1926年1月10日发表在《政治周报》第4期上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毛泽东说,辛亥年的革命力量孤弱的原因之一是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4](p.25)} 1925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看作革命的敌人,将中产阶级看作动摇派,将包括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和小贩在内的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朋友,将工业无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08B004]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作者
作者:张纯厚,延安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延安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延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会副会长。

产阶级看作革命的领导阶级。^{[3](pp.3-9)}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中指出:“已有多数的农工民众参加”革命运动。^{[4](p.33)}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在《农民问题论丛》上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明确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4](p.37)}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与以前特别重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看法相比,思想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

从此,毛泽东集中精力研究了农民问题,开展了一系列农村调查,其代表成果是1927年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这种重视农民、依靠农民的思想一直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一个主旋律。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说:“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是别的民主分子。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5](p.305)}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6](p.1478)}

在毛泽东提出农民问题严重性的时候,党内也有其他领导人表达了同样的思想。1926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农民为国民革命之重要势力,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2](p.2)}1936年11月,在《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一文中,刘少奇说:“工农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基本力量。”^{[2](pp.51-52)}1924年3月9日,在纪念列宁的《列宁与中国》一文中,李维汉认为,列宁思想、主张和策略的实现“尤赖于工农大众及组织坚强的党之拥护。”^{[7](p.11)}1926年12月4日,在湖南全省工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李维汉说:“中国革命主力军是工农阶级。”^{[7](p.23)}

二、关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 结盟思想的演变

关于毛泽东谈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实行政治联盟的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1925年11月21日)。在这次答问中,毛泽东提出,“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大资产阶级

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4](pp.18-19)}

时隔不久,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将大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敌人,将中产阶级看作政治上的动摇派。他说:“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实际革命的乃小资产、半无产、无产这三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4](p.25)}1929年1月,在《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中,毛泽东认为红军可以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平共处,他说:“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4](p.52)}

1937年,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的合作是相对的、暂时的,但又是必须的。他说:“因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暂时性而不要资产阶级,指联合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为投降主义,这是托洛斯基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3](p.276-277)}

1947年,毛泽东提出,在政治上孤立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在经济上则应予以保护。^{[8](p.312)}1948年,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依附于共产党,右翼依附于国民党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在政治上争取其大多数,对其经济地位则须慎重处理。^{[6](p.1289)}1950年代,毛泽东提出通过赎买政策,对资产阶级在经济上逐步消灭,在政治上则与其合作。^{[9](pp.176-180)}

对于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戒备的态度是中共领导人中带普遍性的观点。1926年5月,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的报告中,刘少奇说:“中国资产阶级本来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他们有参加国民革命之可能,但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终究是妥协的,不能彻底的。”^{[2](p.2)}

1926年冬,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右派势力掀起一股反对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的逆流。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这股反动潮流所吓倒,对国民党右派迁就退让。此时,周恩来在中共两广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第37期发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指出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妥协性。他说:“各被压迫阶级的共同目的虽在国民革命,但在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10](p.2)}

1940年12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中原局宣传部的刊物《江淮》创刊号上发表《论抗日民主政权》一文,阐述了关于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观点。他说:“至于中国的资

产阶级,一方面由于它也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它的发展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是矛盾的,所以,它在一定历史时期有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又由于它的软弱,它本身是剥削者,它就容易和革命的敌人妥协,并特别惧怕工农革命力量之壮大,所以,在另外的历史时期,它又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结合,来反对革命。”^{[2](pp.171-172)} 1946年5月4日,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刘少奇主张,对赞成我们的民主纲领的开明绅士及其他党外人士,“均应当继续和他们合作,一个也不要抛弃,以巩固反对封建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2](p.380)}

三、关于灵活务实、广泛结盟策略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和中共领导集体的灵活务实、广泛结盟的策略思想达到成熟和系统化是在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对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逆反心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虽然有与国民党内的反蒋军事力量的局部短期结盟,但排外关门主义的左倾思想在党内仍居统治地位。从1935年开始,面对日本侵略、亡国灭种的压力,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与多年宿敌——国民党和解,并与一切爱国力量结成联盟,一致抗日。在《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陆续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推动联合抗日的文件。1936年9月8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张国涛、任弼时的信中提出停止使用抗日反蒋的口号。^{[4](pp.438-439)} 1936年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随后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表明中共灵活务实、广泛结盟的策略思想在实践上趋于成熟。

1936年7月16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将国内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看作抗日战争胜利的三个条件。并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4](p.401)} 1939年10月4日,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谈到四种统一战线,即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坚固联盟、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可靠联盟、与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的联盟、与买办大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的联盟。后两种联盟虽不是永久性的联盟,但无产阶级应在斗争中求团结,

尽量保持之。这表明中共统一战线思想的成熟和系统化。^{[11](pp.606-607)}

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在总结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时,说:“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11](p.783)} 1941年,毛泽东写了《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批判“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排外路线,批评破坏统一战线政策的错误做法。^{[12](p.342)}

这种务实灵活、广泛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民族矛盾取代阶级斗争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重大政治形势转变的情况下,形成的政治策略思想。除了毛泽东,党的其他重要领导人在同一时期,对于政治形势也有同样的评判。比如,1936年12月,周恩来在关于西安事变的电报中,对当时的形势做了这样的评判:“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指示着阶级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结合,特别是资产阶级营垒之决定性的分化过程,其意义就在推动和加速了资产阶级营垒中左派之集中,打击了中间道路之思想。然而分化过程没有终结,大致的情况仍然存在着三个营垒:抗日、降日、中间。”^{[10](p.74)} 1944年3月,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周恩来对于党的历史上统一战线的情况,做了与毛泽东相同的结论。他说:“大革命时是四个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这四者有区别: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是基本的革命力量;小资产阶级有动摇性;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有时参加革命,有时反对革命。”^{[10](pp.164-165)}

1942年7月20日,在题为《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的给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信中,刘少奇论述了争取中间派,对于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他说:“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与我们的斗争之中,如果中间势力、中间阶层的动向是决定胜负的因素之一的話,如果这些中间势力的动向成为决定战后新中国的重要因素之一的話,那末,我们就应该以极大的注意和切实而广泛的工作去争取中间势力站到我們这一方面来,或在斗争中守善意的中立。”^{[2](p.230)}

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后来题为《论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从全体人民的利益和解放全人类的高度,论证了共产党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说:“我们党现在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

主义革命,不仅只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是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只有当它是站在全体人民的利益上,而不仅是站在本阶级当前部分的利益上,只有当它是组织与团结整个民族与全体人民,而不仅是组织与团结本阶级来进行奋斗,它才能胜利。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体人民,它自己也就不能得到解放。”^{[2](pp.331-332)}

四、关于团结和斗争相结合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最早明确表示反对关门主义,提出统一战线主张,是在1935年12月27日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演讲中。1938年3月3日,在《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中,毛泽东说:“有人要共产党退出八路军,这是绝对主义,是不行的,统一战线是相对的,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12](p.109)}1939年10月4日,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毛泽东将统一战线策略概括为:“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11](p.608)}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更明确地说:“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统一战线中,投降主义是错误的,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弃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13](p.1012)}这说明,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是在1930年代后半期,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过程中逐步成熟和系统化的。

刘少奇和周恩来在1920年代也曾提出了既团结又斗争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1926年5月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的报告中,刘少奇说:“我们工人阶级在某一个时候,即在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冲突最厉害的时候,应与资产阶级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以增强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势力。但当资产阶级一有妥协之倾向,或压迫工人运动时,工人阶级应极力反对,以防备资产阶级骗卖自己。”^{[2](p.2)}1926年12月11日,周恩来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中指出,党在国共合作中应警惕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他说:“为工农阶级奋斗的共产党的活动,当然不外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推进国民革命,以防止其他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影响。这种活动,只有于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利,使革命成份更加充实,决无与他有冲突和分裂的危险。因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10](p.2)}当时,在国民党右派势力掀起反对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的逆流,陈独秀左倾

投降主义控制党的领导的形势下,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思想代表了党内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独立性和斗争性的正确路线。

1936年4月10日,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中,刘少奇批评了白区工作中的王明左倾关门主义,配合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他说:“关门主义的根源是:因为害怕那些反革命派别,所以不敢和他们暂时建立斗争的联合战线,甚至不敢和他们来往谈话;因为不相信自己,恐怕那些反动派别会动摇自己,影响自己,所以自己关门;因为对新的形势估计不足,不相信目前中间阶层和许多社会上层分子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所以不要统一战线。左的关门主义在实质上与右倾机会主义是同一根源。”^{[2](p.31)}1937年7月,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在批评关门主义的同时,刘少奇指出,在与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党内出现了迁就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倾向。所以,要维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这样,刘少奇就比较早地在党内提出了完整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2](p.118)}

1945年4月,在七大发言中,周恩来指出,敌人的营垒是有派别,有集团的,是变化的。并且,他还具体地论证了党与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两面政策。他说:“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有时也会参加到统一战线队伍里来,但是他们带着很明显的两面性。资产阶级有他的两面性,小资产阶级也有他的两面性,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更明显的,他们的反动性的那一面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在与他们合作时,要随时提防他们,反对他们的反动性,绝不能依靠他们。”^{[10](pp.212-213)}

五、关于多党合作、互相监督的体制思想的形成

共产党的历史是与非共产党人士合作的历史,共产党事业的成功是由于获得非共产党人士的支持,由于党与非党人士的合作。所以,毛泽东说:“八路军、新四军、山西的新军等等,也是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内部外部都是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是联盟的意思。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联盟,是工农联盟,党和非党的联盟,我们的军队没有一个不是这样……”^{[5](p.328)}然而,只是到1940年前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集体才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互相监督的政治实践上升到政策和理论的层面。

确切地说,毛泽东在什么时候提出多党合作的政策主张的?李忠全认为毛泽东是在1941年5月8日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讲的。^{[14](p.97)}通过阅读毛泽东的相关论著,本人发现,这种说法是不对

的。事实上,1940年以前,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毛泽东已经有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政策主张。比如,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说:“共产党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11](p.522-523)} 1939年10月5日,毛泽东说:“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宝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15](p.141)} 随后,民意和行政机构选举中三三制的推行促进了这一政策主张的系统化、正规化和理论化。

1940年初,延安中区五乡在突击征粮工作中组织了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党外人士占三分之二的征粮委员会。由于党外人士的积极参与,对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解释和动员,征粮任务提前超额完成。这种做法得到中共边区中央局的肯定和推广,并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6](p.114)} 1940年3月6日,在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中,毛泽东对于建立三三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做了明确规定,即“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但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必须是高质量的,以便保证共产党在政府中的领导地位。^{[11](p.742)} 于是,1940年进行的第二次选举便实行了这种三三制。

共产党领导的三三制是抗日战争中、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中共控制的区域普遍实行的一种政治体制,其实质是多党、多阶级政治合作。在1941年5月1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毛泽东说:“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共产党员被选举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12](p.335)}

毛泽东及时发现这一体制创新并注意到这一创新对于确立党的民主决策机制和民主作风的重大意义。1940年3月6日,在党内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毛泽东说:“必须教育担任行政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

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11](pp.742-743)} 这一文献表明,随着对三三制的确认,《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成为确立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体制的标志。

三三制和多党合作对于确立党为人民服务,党受人民监督的根本原则有重大历史意义。1941年11月6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毛泽东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人民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人民之上。”^{[13](p.809)}

对于多党合作和民主作风,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积极地进行贯彻和推行。1946年5月4日,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刘少奇主张团结知识分子、开明绅士、城市中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他党外人士,继续与其合作,以巩固反封建、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2](p.380)}

1949年4月22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说:“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的问题,对党来说,就是党与非党人士合作的问题;对青年团来说,就是团员与非团员合作的问题。”^{[10](p.326)} 同时,刘少奇注意到利用党外势力,破坏党内有序民主的错误倾向。1941年7月2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的讲演《论党内斗争》中,刘少奇说:“还有些同志(其实这已经不能称为同志)则公然依靠与假借党外的力量来进行党内斗争,向党要挟和恐吓。如有些人,依仗他们一部分的工作成绩,依仗他们的部队和枪杆子,依仗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或某一部分的统一战线关系等,而向党向上级机关进行斗争,要挟上级机关及党接受他们的要求与意见,向党闹独立性,向党宣告独立。或者利用党外的、甚至资产阶级的、敌人的报纸杂志及各种会议来批评党,向党的上级机关及向某些同志和干部进行斗争。很明显的,这与另外一些人依仗党的势力,去强迫、命令、压迫党外的群众,去向党外人士进行敲诈勒索,是一样严重的错误。”^{[2](p.197)}

六、关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思想的形成

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国共合作时期就被提出来了。但由于没有一种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理论和成熟的政治策略,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在口头上表现得很左,要无

产阶级领导权,但在行动上却很右,将革命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正如周恩来在七大会议的发言中所说:“那时贴了很多标语,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一个是要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我们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样的口号也有很多。但口号是口号,而实际上是放弃领导权,认为领导权是天然的,用不着争。所以在政策上就不发展工农武装,不建立工农领导的政府。”^{[10](p.218)}

如前所述,不是共产党内的所有领导人都有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和分裂进行斗争。当时,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已经提出了对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但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理论上是盲目教条的,在行动上幼稚软弱的。当时困扰党的理论和策略问题是:无产阶级应当领导中国革命并实现社会主义,但当时的中国革命却是资产阶级革命。那么,无产阶级能否领导?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不能领导。对于这一问题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政策主张,是毛泽东于1928年10月5日在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提出的。这个报告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在其中,毛泽东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3](p.48)}

第二次内战时期,虽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务实派领导人在军事上实行过与国民党内部反对派的临时性的统一战线,党的主要领导人却从右倾机会主义走向左倾机会主义。在策略上,实行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和军事上的盲动主义,在理论上否定革命阶段论,主张不断革命论,使革命遭到重大损失。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关门主义的左倾思想路线迅速得到纠正。瓦窑堡会议之后,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推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措施。1936年11月20日,刘少奇在题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的党内教材下篇中,指出“当现在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正式形成以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主要危险。但是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因此,要特别警惕“在革命领导权上产生右倾机会主义”。^{[2](p.47)}刘少奇于1937年5月,在苏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当在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中掌握领导权,但领导权只能争取,而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得到。^{[2](p.77)}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即《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理论。其基本观点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前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界定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

义革命,其后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二者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但后者不以建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为最终目标,而是要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11](pp.662-711)}这一理论既反对将革命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政党的右倾思想,也反对不分革命阶段,企图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次革命论或不断革命论的左倾思想。这样,就为中国共产党在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统一战线中掌握资产阶级革命领导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曾经设想,俄国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农村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利用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17](p.769)}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中国快速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指出了切实可行的途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创新。

周恩来在题为《关于统一战线》的发言中,回顾了历史上因党内的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失掉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教训,论证了保障共产党对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务实灵活的统一战线策略原则的必要性,并做了自我批评。^{[10](pp.207-220)}

[参考文献]

- [1] 师锐,李忠全主编.延安时期统一战线问题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 [2] 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5]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 李维汉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8] 毛泽东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9]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0] 周恩来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2]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4]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编.延安时期统一战线问题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 [1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6] 王晋林,秦生.新民主主义模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晓 凌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Chances and Challenges for its Development: The Strategic Culture which directly reflects the state and national strategi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a nation's core values, the cohesion and unity of a nation, and even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The Strategic Culture in China is facing both rare chances for development and grim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We have to seize opportunities, meet challenges,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strategic culture construction. (LI Shen-ming)

To Perfect the Mechanism of Supervision and Restriction and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System of Anti-corruption: Supervision and restriction are two ways of power constraints. The former is the external binding way of power, while the latter is the internal one. The internal restriction is superior to the external supervision.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of corruption of power is that power is not restricted. To oppose corruption, is first of all to prevent corruption, and the key is restriction. Since the power without restriction is bound to corrupt, preventing corrup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opposing corruption. Supervision is also indispensable to bind power. On proper occasions of supervision, it's necessary to highlight the supremacy of supervisors. Scientific mechanism of supervision and restriction has to put emphasis on restriction while supplemented by supervision, and finally forms the virtuous circle between power restriction and supervision. (JIANG De-hai)

Sticking to and Developing of Marxist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Truth and Value by Socialist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t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creativ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how these theories creatively apply and develop Marxist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truth and value in solving three basic questions—"what socialism is and how to build it", "what kind of Party to build and how to build it" and "what kind of development to realize and how to develop", and it finally opens up new realm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ZHAO Jia-ming ZHOU Ya-nan)

On the "Four Unities" of Contemporary Marxism in the Advancing of its Popularization in Colleges: The process of the Sinonization of Chinese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Universities is, in fa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ducators and students, and als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eaching" of related disseminators and the "learning" of students. Thus, when setting the path, we must follow the "four unifications": the unity between getting into the real-life world and leading it as to the content; the unity between the leading role of teachers and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students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the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rowth pattern of college students as to the aim; the unity between strengthening ideological function of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meeting the value of life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ir needs for self-development as to the popular targets; the unity between the explicit carrier fun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implicit carrier function of campus culture infiltration as to the popular carrier. (RUI Hong-yan ZHANG Zhi-yao)

On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Theory of United Front : This paper aims at the explorati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Theory of united fro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Mao Zedong and the collective wisdom of the Party.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indicate that there was a process in which Mao Zedong's and other leaders of the Party's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united front became gradually clarifi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cognizing the importance of alliance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and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thought on the institution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mutual supervision as well as the thought on CPC's leadership in the united front, and the tactical thought for the united front in terms of flexibility and realism, extensive alignment and a combination of solidarity and struggle, Mao Zedong made epoch-making contribution, but Liu Shaoqi and Zhou Enlai also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at different periods. (ZHANG Chun-hou)

Only with an Organization can Human Rights be Safeguarded—on the Role of the Union in Harmonious and Stable Labor Relations: Putting forward the working guideline of "safeguard human rights with organization", The Chinese Trade Unions attempt to establish the rights-defending concept of "staff-oriented, conform to the law voluntarily and safeguard rights scientifically", and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harmonious and stable labor relationship.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already widely accepted the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n workplaces, the tripartite mechanism and the social dialogue system, which are carried out with basis of group negotiation. To a large extent,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rkers depends on their systematical bargaining power. To further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labor relations and perfect labor protection mechanism, trade unions have to play active role in performing duties lawfully, coordinating interests, resolving conflicts and clearing up worries and problems. (XIAO Wei)

On Marx's Critique and His Surpass of Modernity: Marx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modern theory. Based on the dialectics, Marx not only saw the achievements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but also its flaws, which makes his critique of modernity scientific and profound but not the simple defenders of modernity and the post-modernist that deconstructs the pursuit of all values. Starting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 looked into the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and the root causes of its slavery, which makes him see its transitional and 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Meanwhile, he pointed out the new path to completely go beyond the modernity and realize human liberation by socialist revolution, which finally makes him different from those post-modern scholars who pay attention to the ideological deconstruction. Marx's critique of modernity is different from those post-modern scholars who thoroughly deconstruct modernity and replace it with post-modernity, what he envisions is the replacement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by socialist modernity. (CHEN Zhi-gang)

Interpreting Lenin's Essays on Class Struggle: The content of "class struggle" in Lenin's book "Karl Marx" and "Marxist formula-